



長夜忽晴

(工人專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的教导，把我社过去配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辑出版的工人家史加以补充、修改再版。同时又增添了一些新的篇幅。

《长夜怒涛》一书，包括两个矿工、一个纱厂工人和一个烟厂工人的家史。它是旧社会工人阶级身受帝、官、封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有力声讨。

《长夜怒涛》一方面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在那豺狼当道，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一方面又生动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团结战斗的阶级情谊。它以鲜明的新旧社会对比，热情歌颂了解放后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有了地位，并且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幸福情景。

当我们享受着翻身解放，胜利喜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社会的苦难生活。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叛徒、卖国贼林彪为要达到在我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挥舞起“克己复礼”的破旗，鼓吹孔孟之道，宣扬“仁政”和“天命”，用以欺骗和麻醉人民。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践证明，联系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提高人民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狠批孔孟之道，不信天命干革命，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九七五年四月

K259
8044

目 录

矿工怒火	(1)
仁者吃人	(24)
血泪的控诉	(38)
徒工仇	(46)

矿工怒火

鹤壁矿务局第一煤矿退休老工人 王春明

我老家住在安阳县善应村，西依太行山，北临善应河，这里土地肥沃，地下煤藏丰富。可是，在旧社会土地肥沃对我们劳动人民来说又有什么用，我们村的土地被两户地主、六户富农霸占去了。地下的煤更没有穷人的份，我家人老四辈下煤窑，被黑暗的旧社会夺去了九口人的生命，到了临解放的那一年，祖传下来的全部财产只有一盏下煤窑用的破油灯和一顶破毡帽。

我家四代人下窑，九口人丧命。曾祖父下煤窑，被砸死在井下。为了餬口，祖父擦干了眼泪，戴上曾祖父留下的破毡帽，提起破油灯，又下井了，干了几年，不幸井下冒顶，又被闷死在里边。祖父死后，家中生活更加困难，不久奶奶就饿死了。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哪里会有我们劳动人民的活路。

四代苦难

父亲兄弟四个，我大伯王帮印，下了茶壶地煤窑，这个窑的资本家，为了赚钱拚命地叫工人多出煤，就是不多花钱

买木头架棚，顶板龇牙咧嘴的，经常往下掉石头，大伯质问资本家好几回，资本家口头上也答应买，可就是光敲梆子不卖油。大伯明知有危险，但是，因为家有几口人等着吃饭，不下井就饿肚子，只得硬着头皮下井了，结果大伯活活被砸死在井下。

二伯王来柱，生来骨架大，是个硬汉子，别人拉一百斤上山直喘粗气，他拉一百五十斤，气不喘，脸不红，碰到别人拉不动时，他还帮一把。有一年，他正在安阳水冶下坡煤窑下井，碰上一次大冒顶，活活闷死在井下。

我父亲王金柱，排行第三，一直在煤窑上干活。是个下煤窑的全把式，什么活都会干。在旧社会有技术又顶什么用呢！父亲下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才给二斤米，一天二斤粮食，父母和我兄弟四个，实在无法维持生活，无可奈何，父亲把我拉到他跟前说：“春明，你是老大，爹实在养活不了你们，咱不能等着饿死，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吧！”于是爹托人说情把我送到地主申万富家当放牛娃。

申万富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笑面虎”。我刚到他家，他就把一头大犍牛、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交给我放。这三头牛，老的老，小的小，有的走的快，有的走的慢，有的性子躁，有的性子慢。我这个九岁的孩子，照顾了这一头，照顾不了那一头，真是不好放。有一天，我赶着牛走到半路上，牛一歪脖，吃了一嘴谷子。这谷子是大地主申天宝宝的。申天宝宝是俺村有名的恶霸，外号叫“惹不起”。这天正好他在路边看见了，他拿着一根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了我一顿。打一顿不算

完，硬要叫申万富赔他二斤谷子。申万富本来是个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家伙，他不但不赔，反而在我身上出气，又用棍子把我打了一顿，最后逼得我妈没办法，只得起早贪黑，拾了二斤豆子赔申天宝，才算结束了这场灾难。

我每天放牛早出晚归，一到天黑，累得浑身酸痛，又渴又饿。到吃饭的时候，地主婆见牛肚子鼓着，就给我两个红薯面馍，要是牛肚子不鼓，我连饭也吃不上。就这样，申万富的小老婆还叫我刷锅、洗碗、倒尿盆。有一次，我失手打了一个碗，她就打了我一个半死，她还说要不是雇我给她家放牛，我早就饿死了。这是什么话！她打了我，不给饭吃，还说对我好。我想，为什么都是人，地主就能随便动手打我，我就该挨打？就是在家挨饿，也不受他这个窝囊气，一气之下，不干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地主申万富家。

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越发坏了，才四十三岁的人，面黄肌瘦，咳嗽不止，腰也累弯了，不能经常下煤窑，家里连稀饭也不能按顿吃了。父亲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孩子，跟爹下窑吧，不然全家就要饿死。”因为我经常看到从井下往外抬死人，又看到父亲累的那个样子，一听说下窑，我就说：“爹，我怕。”我这么一说，爹掉泪了，妈也哭了。爹紧紧地搂着我说：“孩子，不是爹娘不疼你，是生活没办法啊！”说了三次，全家哭了三次，最后我还是跟爹下井了。

第一天下井，我坐在爹怀里，爹坐在绳套上，在井筒里转悠转悠地下到井底。把头给了我一个小柳斗，能盛十五、六斤水，指定了一个水坑，叫我保证这个坑不能流满水，把水

提到老巷里。巷道是多么低啊！大人爬着走，小孩弯腰走，好容易熬过了十二个小时，升了井，身上的骨头好象散了架一样。见了妈，我不由得眼泪直往下掉。爹见我哭，就说：

“不用哭了，我也是十一岁开始下窑，过几天就好了。”第二天把头给我增加到两个坑，第三天增加到三个坑，一天增加一个，一直增加到五个。我两只手提着柳斗，另外挤出一个指头来提灯，两脚不停地跑着，提了这个坑的水，那个坑的水又漫出来了，跑得我汗流浹背，汗水流到眼里也顾不得擦了。就这样，五个坑中，总有三个坑往外流水，眼看巷道里的水就有脚面深了。我正在跑得手忙脚乱的时候，把头王黑雷来了，黑影里我没发现他，他可盯着我了，他乘我低头打水的时候，冷不防打了我一闷棍，打得我两眼发黑，一头栽到坑里，没等我起来，乒乓又是几棍子，打得我皮开肉绽。王黑雷可着嗓子说：“别人都能提完，偏你提不完，耽误几十车煤拉不出来。今天谅你初犯，扣你一天工资。”这样，我累死累活地白干了一天，还落了儿棍子，这到哪去说理，真没有穷人的活路啊！

童 工 血 泪

我十二岁到了水泉沟煤窑，一个小车拉五十斤煤，我一个人拉不动，就和我们村里的王龙海和王林贵两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孩子合起来干，包了两个煤车。一个班拉三十车煤，三个人四斤米，拉不完不能上井。拉上山时，我拉一个

小车，龙海拉一个小车，林贵轮着给我们推车。有一天，龙海拉完十车煤，找了一个黑影地方，刚坐下休息，因支架棚子年久失修，忽隆一声，从顶板上掉下一块大石头，正好压住龙海。我和林贵闻声急忙赶去搬石头，龙海的腰已被压断，空张着嘴哭不出声来。我们背着龙海上了井，去找资本家张好林。张好林是个有两顷地的大地主，又是伪区公所的区长，有钱有势，是一条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头蛇。我们把龙海背到张好林家门口，把门的问我谁？我说：“找张掌柜。”“找他干啥？”我说：“出人命了，非找张掌柜不可。”张好林出来，就有点不耐烦地问：“找我干啥？”我说：“砸伤了人了，你管不管？”张好林说：“下煤窑是你们自己来的，不是我用大轿请来的，砸伤了与我无关。”我说：“反正是在你们窑砸伤的。”张好林胡搅蛮缠地说：“又不是我搬石头砸的，不服气你们去告吧，我没有时间和你们罗嗦这些事。”说完，把门一关走了。我们年龄小没办法，只好把龙海背到家。龙海的奶奶和妈妈两辈人就龙海这么一个孩子，因为没有钱治疗，十几天龙海就死去了。

我和林贵埋了小伙伴，心里很难过，拖着沉重的步子，又回到窑上，俺俩合伙拉一车煤。有一天，我们从下山往上山拉煤，这个坡很陡，空身上山还得两手着地往上爬，我们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拉着五十斤重的煤筐，实在够呛。我在前边拉，林贵在后边推，一个大煤块把我绊倒，哗啦一声，连筐带人一齐往下滚，林贵冷不防，猛一下冲到煤墙上，失去了知觉。我滚了几丈远才停了下来，脚上划了一个大口子，

我也顾不得痛了，强撑着爬到上边，只见林贵歪着头躺在煤壁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我急忙大声喊他，林贵就是不吭声，我心里冬冬直跳，连忙背起林贵就走。在大巷里碰见一个把头，他用灯一照，怪声怪气地说：“啊！你们两个小黑鬼不干活还在这里背着玩，劲头真不小啊！”我赶忙说：

“林贵出事了。”把头提高嗓门说：“什么了不起的事，值得这样慌张！”“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一边说，一边把林贵放下。把头用灯向林贵照了一下，林贵小脸蜡黄，头上直出血，腿也摔断了。可是把头却毫不在意地说：“不要紧，划破点皮，一会儿就好了。”说着用手抓了一把煤末，狠狠地往林贵头上一揉，对我一摆手：“滚吧。”到了井上，我想背着林贵找资本家说理，可是前几天龙海的悲惨遭遇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资本家的心肠毒如蛇蝎，找他也是白搭，怎么办呢？只有背着林贵回他家。林贵的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去年死在井下，母亲饿死了。林贵的亲人只有大爷和大娘。老两口一贫如洗，林贵被砸得这样惨，他们心里很难过。家里没有饭吃，大娘就出外要饭，不久大娘也连冻带饿死在外面了。林贵和他大爷苦熬，总算活了过来，但是林贵已经成了残废，再也不能干活了。在那吃人的旧社会，真是一面是资本家的黄金万贯，一面是童工们的血泪斑斑。

爹 爹 惨 死

在井下熬过了四年，我已经十五岁了，不光会挖煤，也

学会打井了。爹是煤窑的全把式，采煤、砌碛样样都中，打井筒更是在行，爹打井，我也跟着做二手活。在旧社会，打井不是那么容易，没钻机，全凭经验，谁能一下子看清地下有多厚的煤层？

有一次，一个资本家看好了一块地方，问爹能不能打出煤来，爹东转西转，看了半天，摇头说不十分保险。资本家一听说不保险，眼睛一转，坏主意来了，他说：“这么着吧，现在我手头也紧，工资按日先发一半，其余的等打出煤来再说。”干了两个月，打了二十丈深，还不见煤，资本家宣布不打了，那一半工资咋算？资本家一字不提，工人们找他要工资，他狡猾地说：“我是有言在先，等出了煤一个也不缺，现在没出煤，我自己的几十石粮食都赔在里边了，还有钱发工资？”工人干了两个月算是白干了。资本家只算他的剥削账，哪管穷人的死活。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都是靠骗人剥削起家的。

爹是个老实人，受了几次骗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资本家不喝穷人的血，就不能成为资本家。为了不和富人打交道，他到西山看了几天，找了一块地方，和俺村十二个穷苦人合伙，自己打了一个小窑，挖了五丈深就出煤了，煤层虽然只有八寸厚，可是人心齐，干劲大，每天能挖一千二百斤煤，每个劳力每天能分一百来斤煤，换点粮食，换点菜，日子总比给资本家干活好一些。约摸半个多月，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爹看着自己劳动的果实，消瘦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但是，好景不长，在旧社会哪里有穷人的安生日子。一天，伪军队长刘五生从远处看到山上堆着一堆煤，他

象饿狼见了肉一样，垂涎三尺，企图占为己有。第二天他便带着两个兵，拿着铁锹到我们打的那个小窑跟前打井，这明明是欺负人，我们当然不让他打井，双方争执起来。实际上他也不是真来打井，他说：“不打新井和你们合伙干也行，我自己一股，你们十二个人一股。”他一不出人，二不出钱，每天挖出的一千二百斤煤，刘五生白白讹去一半，我们十二家每人每天只能得五十斤煤，生活顾不住，我们几家一商量，干脆不干，刘五生看我们不干了，他这个专靠剥削别人才能活命的家伙，也就只好滚蛋了。

我们被刘五生挤走后，我爹领我到拐头地煤窑给资本家杜成斋打井筒。打井用的井绳，一般都是用皮的，可是杜成斋这个资本家哪管工人的死活，他为了加紧剥削，不买皮井绳，而用麻井绳，麻绳用了几天就磨起了毛。工人们找资本家要求换根绳，杜成斋说：“你们不懂，绳子越湿越结实，不信你们拿根草绳试一试。”工人们说了几次，杜成斋当成耳旁风，根本不理那一套。我爹一气之下就去找杜成斋说理：

“买得起马就备得起鞍，井筒都打了，连根绳都买不起？”杜成斋这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恶狼，他两眼一翻冲我爹说：“你说大话不腰痛，我又没开银行，哪来的这么多钱。”这一天，麻绳还是伸了盘，盘了伸，辘轳还是照常转着，三股绳已磨断了两股，还是照常地转着。正赶上我爹升井的时候，井绳崩的一声断了，我爹被活活摔死在井下。等我把爹背到井上，已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扑倒在爹的尸体上，痛哭起来，想来想去爹是资本家害死的，他若肯买根新绳就出不

了人命了。资本家是吃人的狼，非找资本家算账不可。

工友们连夜给我家送信。天刚亮，妈妈领着几个弟弟一路哭着从二十里外的老家赶来了。我们全家抬着爹的尸体，到杜成斋家去说理，杜成斋家门口站着两个岗，不叫我们进，我们在门口吵，妈在门前哭，周围围了一大群同情我们的群众。杜成斋看躲不过去，只得出来了，他一出门就蛮不讲理地说：“我花钱，你出人，死了怨你自己不小心。”我一步跨到他面前指着他说：“你要花钱买根绳，也不会出人命。”“井绳不好你不会不下。”杜成斋满脸横肉不讲理了。我就开门见山地质问他：“人死了，你管不管？”杜成斋说：“管。”他叫门警拿了几个馍扔给我。呸！这简直是对我爹爹的污辱。我拿起馍朝杜成斋的狗头上狠狠地砸去，接着我一头撞向这个老家伙。杜成斋见我要拚命了，吓得扭头就往院子里跑，门警赶忙把大门一关，不敢出来了。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一家的冤仇又往哪里去伸诉，爹爹就这样白白地死去了。

七 十 条 人 命

爹死后，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灯和破毡帽，全家人十分伤心，发誓不再下窑了。为了活命，我妈妈领着我们租种了保长王合几亩地。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也没有穷人的活路，农村同样是富人的天下，保长王合一面逼租，一面催交苛捐杂税，头一天不交，第二天就得加一倍，第三天就得

加两倍。我家本来就揭不开锅，他这样累计，我们如何招架得了！我们一家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四叔从三杆枪煤窑回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况，日子难熬下去，就劝我下窑。他说，我下一个班二斤米，我弟煤山下一个班一斤米，这样凑合着全家还能勉强活下去。妈合计四叔说得也对，眼前又没有别的路可走，也就只有这样了。于是四叔带着我和弟弟一道，进了三杆枪煤窑。

三杆枪煤窑在鹤壁一带是个大窑，每个班七十多人。干了几个月，井下的水渐渐地多起来，我双手捧了一些淋帮水，放在嘴里尝尝，味道很苦。根据以往的经验，离这不远一定有老窑存水了。我又走进掘进头，里边冰凉冰凉的，我用一只手贴向煤壁，整个胳膊好象过电一样，冰凉冰凉的，这些迹象证明，很快井下就要出事了。

我勉强干完这一班，升井的时候，已是半夜。我四叔和煤山来接班，我把井下要出水的预兆对四叔说了一下，叫他这几天不要下井，四叔有些犹豫。这时候，把头催我四叔赶快下井，四叔想了想说：“先下这一班，看看再说。”他一面说着，一面拉着煤山下井了。

我回到住处，吃罢饭刚想睡觉，听到外面乱嚷嚷的，说是井下出事了。原来这一班人下井，放第一茬炮的时候，一炮崩透了煤墙，老窑存的水顺巷道往下直灌。工人们看着大水的来势不善，逃命要紧，齐往井口跑，有的抓井绳，有的跳上起重筐，都想逃出井口。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起重绳崩的一声断了，七十个工人完全死于井底下。后来才

知道，这井绳是资本家李贵砍断的。李贵本身是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平时杀人不眨眼。那天正好赶上他在井口，听到井下吵嚷声，他知道出了大事了，这个杀人的刽子手，怕工人出来“闹事”，就把井绳砍断了，然后他杀气腾腾地对两个绞车工说：“这事要透出风声，我要你们的脑袋！”

阶级兄弟心连心，绞车工揭发了他的罪行。千仇万恨涌向心头，遇难的家属要找资本家李贵算账，可是这个家伙怕家属跟他干，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人 间 地 狱

四叔和二弟死后，我又一次发誓不下煤窑。真是象俗话所说的，“屋漏又遭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紧接着，一间破房子也被保长王合讹去了，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但为了生活，全家人忍受着剜心的疼痛，离乡背井，流浪到太原。在太原人地两生，举目无亲，哪里是个安身之处，实在没法，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个土窑洞住下了。有一天，我到城里想找个出力的地方，刚进南门，碰见一个穿西服的人，他见我就问：“想干活吗？”我说：“想干。”心里想：真是巧，找不着碰着了。那人接着说：“干一天给一元二角钱，跟我走吧！”我说：“还没有吃饭。”他就顺手给我四个白馍。拿着白馍，我把两个放起来，准备给妈和弟弟吃，剩下两个，我一边走一边吃。谁知这个家伙把我们弄到铁闷子火车上，车门一锁，一个劲地开起来了，

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受骗了。火车从正晌午一直开到天黑，才停下来。

一打开车门，两个日本兵端着枪把我们叫了出来，押到一个土屋里又把门锁上，门口还站了岗，不准出入。该吃饭了，提来一桶水，每人分两个红面馍。夜里，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都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睡不着觉，只好背对背地坐着，一夜之间，脚都冻肿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拿着枪，把我们押出来，只见四周岗楼林立，周围是一层一层的铁丝网，外加一层电网，活象个大监狱。

日本兵把我们押进一个斜井，井门口站着—个日本兵，井口是个铁栅门，我们进去后，门又锁得紧紧的。我们走到井里，里边又闷又热，又腥又臭，工人们都光着身子，连个破毡帽也没有，有的挖煤，有的抬煤，动作很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的倒下去就起不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新来的人，都露出同情和惊奇的眼光，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从太原被骗来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人间地狱——大同的圈窑。

圈窑真称得起人间地狱，二十个人有一个工头跟着。这工头不是一般的工头，他们腰里掖着枪，左手拿棍，右手拿皮鞭，轻者打皮鞭，重者—棍打个半死，如有半点反抗就地枪杀。

在阴森森的矿井里，谁也不说—句话。—天送两次饭，每人两个红面馍，提去—桶凉水。后来每顿饭给—碗黑豆，

黑豆配凉水，井下工人没有一个不拉肚子的。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夜，一连七天七夜不能睡觉，有时干着干着手一拄镢头就睡着了。工头见谁站着不动，过来就是一闷棍。我亲眼看见每天总要打死一两个人，人死了往老塘里一扔就完了。干够七天，才被工头押着走出井口铁门，晒晒太阳，晾晾风，晒够三个小时，又被押着走进斜井的铁门。

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吃人的牢笼？这念头一直在我脑子里回旋着。

我第二次出来晾风的时候，由于在井下缺少营养、不见阳光，一出井口，觉得天旋地转，阳光好象万道银丝，刺进眼睛，刺进脑髓，什么东西也看不清。在井下想见阳光，这时又怕见阳光了。

这样的人间地狱，谁能受得了，和我在一起挖煤的人，没多天就死去五十多个。我虽然没死，头上身上也挨了不少棍子，到现在还留着斑斑伤疤。

有一次，工头派我和董其贵上井拿筐，半路上，我问董其贵：“咱们想个办法跑吧？”他说：“要是跑不脱的话，不是电死就是被打死。”我说：“反正是死，死在井上比死在井下强，碰巧了还能逃条活命。”“对，咱们看机会。”董其贵答应着。两个人来到井口，正是午夜，把门的日本鬼子，抱着枪正打瞌睡，我轻轻地拉了下铁门，一个铁链子连着两扇门，不是那么紧，我又把铁链子松了松，铁门出现了一条缝儿，我在董其贵耳边轻声说：“拉！”董其贵使劲地往两边掰着两个铁门扇，我扁着身子挤出了门；接着，我掰

着门，董其贵也挤出来了。我们轻轻地走出去，把门的日本鬼子并未发觉。俺俩出了井口，在院子里的黑暗处转了一圈，都是电网，便发起愁来；又转了一圈，看见一个水沟，沟里有一团乱铁丝网，我用大棍一挑，把铁丝网弄到一旁，发现有一个口，可以通到外面，我们钻出来了。两个人钻出电网，好象出笼的鸟儿，猛跑起来。跑了约五六里地，看看后面没有人追，才停下来休息。我问董其贵：“你是哪儿人？去什么地方？”他说：“我是东北人，要回东北去。”我说：“我妈和弟弟在太原，我要回太原。”就这样，两个患难弟兄，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各自走了。

死 里 逃 生

刚刚逃出来，心里总是害怕，再加上双眼怕见阳光，我就白天找个麦秸窝睡觉，晚上走路，走了几天才到太原北门。那天天已经亮了，眼睛也渐渐地适应了阳光，我多么想见妈妈和弟弟啊！我的脚步越来越急了，心里也越来越紧张了，家里是什么样子呢？

我正走着，身旁一辆卡车猛地停住了，从车上跳下来几个日本兵，嘴里喊着：“苦力的干活！”不容分说，把我架上汽车，嗡地一声，汽车又开走了。开到一个有电网围着的平场子里停下来，把我推下车，给了一个铁锨叫干活。

十冬腊月，北风呼啸，我穿着不能遮体的破单衣，戴着一顶烂帽，光着脚，冻得身上象刀子割一样。吃的是红面

馍，喝的是半温水。工人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日本鬼子却吃大米饭、猪肉，吃不完都倒在猪槽里。

原来这是给日本鬼子修飞机场。场内住着很多鬼子，他们训练狗，专门对付劳苦工人。日本鬼子先扎一个纸人，穿上破烂衣服，里边裹着一块肉，鬼子一指，狗就扑向纸人，三扑两扑把肉抓出来吃了。慢慢地狗就抓工人了。日本鬼子训练了四五条大狗，他们在工地带着来回乱串，用来代替监工的。鬼子常常牵着狗，站在高岗上向周围看着，见谁不抬着筐跑，就用手一指，狗一摇尾巴扑上前去，先一口咬住腿，然后再用爪子扒肚子。我亲眼看见狗吃了几个人。有一次，我正在干活，日本鬼子牵着狗瞅着我笑，我正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鬼子手一指，狗就扑向我，一口咬住了脚脖，把我扯倒，我打了几个滚，才算没有叫狗咬死，但我的脚脖被狗咬去了一块。一个叫王海的工友马上扶起我，找了一块水泥袋纸，给我包扎起来。我想：象这样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迟早也是一死。我决心冒险再逃。这天夜里，我沿着电网看了一圈，见有一个水沟，就顺着水沟钻出电网，拄着一根棍子，一瘸一瘸地离开了这个杀人的刑场。

再 陷 虎 穴

走了半夜才摸到家，妈见我又瘦又瘸，头发半尺长，她抚摸着我的头又悲又喜地说：“孩子！你这几个月到哪儿去了？”我把被骗下圈套、被抓修飞机场的事说了一遍，全家

哭起来了。哭有什么用，沉重的生活担子，逼得我不得不又东奔西跑去找活干。没找到活，碰到了两个老乡，一个叫王富贵，一个叫王良，他俩对我说：“太原西三百五十里远，有个悬杆煤窑，有技术的人下一个班给一斤十二两米。”我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听到这消息，又想去又害怕。回家和妈妈商量，妈也只好同意了。没路费，妈把唯一的囫囵褂子卖了两块半钱，我拿着一块钱买了一张火车票，搭车走了。到悬杆煤窑后，很快就上工了。上了两个班，都是先一天领第二天的米。我估摸着，全家都到矿上，还比在太原强些。于是，我把妈和弟弟接到这里。

悬杆煤窑的周围用铁丝网围着，通了电。圈里除了日本鬼子住的是瓦房外，工人们住的是个大棚子，有家属的用一张席子隔起来。夜里天气冷，棚子里四面透风，好象睡在露天地一样。工人弄点煤烤火，日本鬼子怕烧了棚，强迫着工人用水泼灭。晚上，孩子们冻得直哭叫。

在井下，谁行动慢了，工头抡起棍子就打。在井下累个半死，到窑上冻个半死。原来说给米，后来给成棉籽饼。工人们先是面黄肌瘦，慢慢地就浮肿起来，脸肿腿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不少人一头栽倒地下，口吐白沫，躺一两天就死了。

工人们一躺倒，工头就不发口粮，每天只给两个胡萝卜。工棚里每天总得抬三五个死人出去。死了人，工头叫工人把尸首抬到万人沟边，一扔就算完了。这里大白天成群的狗，夜里成群的狼，到处乱窜着吃死人。这沟里究竟扔了多少死人，谁也不知道。

每到晚上，带家属的更是倒霉。夜里，日本人拿着手电筒，满棚子乱串，看见青年妇女就拉走。我住的工棚里有个青年工人，带着妻子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日本鬼子要抢他的妻子，这个青年人刚要去和鬼子拚，当场被杀死了，妻子被污辱后上吊自杀了，小孩也饿死了。工人们气不过，就纷纷逃跑。日本鬼子怕跑人越多，就加强岗哨。上班时，日本鬼子端枪押着工人到井口。

我妈生病了，弟弟也生病了，我的腿直发软，也要病了，全家人眼看着活不成了。一天，妈对我说：“春明，趁咱还有口气，赶快回家吧，死也死在家门口。”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全家人逃走了。

造 反 有 理

经历了千难万险才从太原回到安阳，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虽然还是一贫如洗，但我们总算活着回来了。下了火车往西走，到了杨家疙疸，正往前走着，看见路旁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那里痛哭。我妈是个软心肠人，就上前去问那姑娘为啥哭，那个姑娘叫窦玉花，她哭着说：“俺爹被地主逼债逼死了，俺娘也被逼得上吊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听到这里，我妈也跟着姑娘哭起来。

穷人和穷人心连心。哭了一会儿，又说了一会儿家常，我妈就对那个姑娘说：“俺家就在那边善应村，也是穷得地没一分，椽没一根，你若是不嫌俺穷，就跟我们一块儿过吧：

你要是不愿意，咱们以后当门亲戚走也行。”奚玉花听了我妈的话，抬起头来看看我们一家人，点了点头。就这样，我们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口人。

回到家，没有了房子，全家人无处安身，只好在村头破庙里住下来。

生活还是没有一点办法，为了吃饭，我又下了沙石湾煤窑。

沙石湾煤窑的资本家，名叫王三全，是这里皇协军的头子，手下有一批反动武装。

王三全开这座煤窑，赚了不少钱，还拖拖延延地不给工人开工资，工人们都是没有隔夜粮的穷人，哪能等得及。于是就成群结队地找他要工资，每找他一次，他总是推托说：

“唉！我也是难啊，你们看，有煤卖不出去，等两天吧。”过两天，又去找他，王三全还是装穷不给发工资。工人们实在没办法，多少年的经验证明，资本家是不会发善心的，只能靠斗争。我们就串连十来个人，想着非得设法治他一下不可。大家说：假若工人都一齐不干活，煤采不出来，水排不出去，给他来个淹井，看他发不发工资？我们商量好以后，第二天一齐不上班了。这一来，果然灵验，王三全有点着慌，他派人叫工人上班，工人说：“肚子没吃饱不能下井！”他知道这里有文章，就打听串连不叫工人上班的领头人。有个小把头给王三全透了气，王三全一打听是我领的头，可把他气坏了。

王三全派了三个皇协军，拿绳背枪，到破庙里找我，见

了面不论青红皂白，把我捆起来吊在树上就打。打了一顿又带到皇协军队部；王三全亲自“审问”：“是你不叫他们上班？”我理直气壮地说：“一人一姓，谁也挡不住谁，他们能听我指挥？”王三全说：“我就奇怪，为什么一齐不上班？”我说：“吃不饱咋能上班？”他说：“叫他们上班，马上给他们开工资。”王三全把欠下的十三天工资都开了，工人的斗争，初步取得了胜利。

在苦难的共同生活里，我和玉花互帮互助，彼此有了了解，我俩准备就结婚。但是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我被捆走挨打的那天，我的未婚妻窦玉花被吓出了病，没到三天就死了。

换 了 人 间

一九四八年，我的老家善应村解放了。我从煤窑回到家，参加了反霸和土地改革的伟大政治运动。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在党的领导下，我和俺村的穷哥们，跟土改工作队一起，斗倒了地主恶霸，我们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了主人。当我和大家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时，我的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这泪是幸福的眼泪。在旧社会，我在资本家鞭打之下，没掉过泪；被恶狗咬伤，没掉过泪；就是叔叔、二弟淹死，我也很少流泪，都是把泪水往肚里咽。现在我这九死一生的人，终于翻了身，政治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保障，生活上不愁吃不愁穿，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我怎能不热泪盈眶呢！

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党号召煤矿工人回矿工作，我这个煤矿工人真想回煤矿了。一天，我找村长说：“村长，我想回矿啊！”我这么一提，他意味深长地说：“那一年你爹死了，你不是发誓不下窑了吗？现在自己提出回矿，那好啊！谈谈你的想法吧！”是啊！在那吃人的旧社会，我干了二十八年的煤窑，每换一个煤窑，我都曾发誓不再干那人间地狱的活了，但那是旧社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的天下，我们工人和贫下中农没有掌权，想脱离也脱离不了。现在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干煤矿是内行，我应该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为社会主义为世界革命作点贡献。就这样，我到小西天煤矿又当工人了。

解放后的小西天煤矿，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煤矿工人获得了新生。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矿上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揭露和清算了资本家和把头的罪恶，“煤黑子”当家做了主人。我亲眼看着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在这里，我还见了很多在旧社会一起受过苦的老伙伴。大家都说：这里一切都变了，下井有工作服，上井有澡塘。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称为“煤黑子”的人，竟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管理自己的矿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在旧社会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现在竟然变成了事实。我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恩人毛主席。

后来，鹤壁建矿的时候，我又从小西天调到鹤壁第一煤

矿。到矿后，领导上非常关心我，当领导上知道我的眼睛是因为解放前在山西大同下圈窑遗留下后遗症，看不清东西时，就把我送到邯郸眼科医院治疗，经过医院几个月的精心医治，终于把我的眼睛治好了。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当时我想，党和毛主席不但把我从人间地狱里拯救出来，而且还把旧社会折磨我留下的病治好。这使我多么激动，我一次又一次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常常站在毛主席像前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现在，我的闺女出嫁了，儿子也参加了工作，当上了工人，生活过得很幸福。一九七三年，领导上照顾我年纪大了，劝我退休。我虽然退休，但心还在矿上，闲不住啊！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林彪效法孔老二搞什么“克己复礼”，要像孔老二那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要那些地主资本家重新上台，要咱们劳动人民重走回头路，再吃二遍苦，我听了以后，怒火万丈，我们家四辈下窑，死了九口，那个罪我是受够了。我和同志们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罪行，不仅口诛笔伐，而且要有行动，我向领导要求回矿参加工作，有多少力出多少力，我老了不能下井采煤，做些轻微工作也可以，领导上批准我上工，在矿人民医院干些零碎活。孔老二宣扬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王春明在旧社会年轻力壮，挨饿受冻；新社会年纪老了，身体弱了，也没长三头六臂，“命”猛然就好了，象我这样的受苦人全国有千千万万，难道他们也是“命”都好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生活过得

好，是斗争得来的。饮水思源，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劳动人民闹翻身，我王春明哪会有今天呀！

我祖传的那个破油灯和烂毡帽，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不但给青年工人讲，还给我的两个孩子讲，让我们的后代记住好日子来得不易，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革命进行到底！

仁者吃人

——记新密矿务局老矿工董长河同志的家史

“老虎嘴巴豺狼心，孔孟之道比毒蛇还要毒三分。”这是广大劳动人民通过无数次亲身体会和悲惨遭遇，对孔孟之道得出的结论，也是对孔孟之道反动本质的深刻批判。

新密矿务局老工人董长河，就是在饱尝了孔孟之道的毒害后，逐步认清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最后走向斗争道路的。

弟弟、母亲的惨死

董长河同志是登封县川口村人。从他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地无一垄，椽无一根，只有一孔破窑洞。全家六口人指望父亲董留义一根扁担两只肩，挑挑担担，卖盆卖罐过日子。一九三二年，登封遇荒年，庄稼几乎绝收，穷苦人的生活就象在刀尖上一样难过。为了逃个活命，不少家拖儿带女外出逃荒要饭。长河父母临外出要饭时，把长河送到大地主景丙兰家去放羊。这年，长河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地主景丙兰是个笑面虎，他见长河爹拉着长河眼泪沾襟，就假仁

假义，一本正经地说：“孩子交给我，你情放心啦！乡里乡亲的谁还不讲个‘仁义’。”并且当面锣、对面鼓地言明：放一年羊给两双鞋、三斗粮。

长河到他家后，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风里来，雨里去，在野外放羊；回来后，还得推磨，担水，扫地，倒尿壶，从早到晚，没明没夜地干。就这样狠心的地主还不满意，张口就骂，抬手就打。长河每到夜深人静时，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羊棚，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他多么盼望爹妈早些逃荒回来。长河天真地想：等爹妈逃荒回来日子好过了，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再也不受这帮地主老财的气了。

好容易熬到年底，长河听说父母真的逃荒回来了，他多么高兴啊！长河急忙去找地主领粮食。景丙兰正坐在客堂里桃花寿椅上养神。长河进去说：“我要领粮食回家。”景丙兰一听，忽地站起来，板着脸孔说：“羊放的干瘦，不罚你我这就够‘仁义’啦！还领什么粮。”长河见地主要赖，又气又急地反驳说：“你为啥说话不算数，你讲的啥‘仁义’？”景丙兰被质问得恼羞成怒，他顺手抓起一把条帚，劈头盖脸地把董长河毒打一顿，长河给地主干了一年，落的是满身伤疤，一顿毒打。地主景丙兰什么也没有给他，就这样被撵了出来。

长河归心似箭，他怀着满腔怒火，带着一身伤疤，三步并成两步地往家赶。当他刚跨进离别一年的破窑洞时，他怔住了。骨瘦如柴的母亲，正紧紧地抱着长河五岁的小弟弟海

波，一边大声哭喊着海波的名字，一边用手掏着小海波饿死前吃在嘴里的黄土；另外两个大一点的弟弟围在旁边哭；父亲抱着头蹲在墙角里直叹气。见此惨景，长河咬破嘴唇忍不住“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母亲看见长河赤脚露体，满脸伤痕，站在自己的面前，更是悲愤交加，一家人哭成了一团。

过年了，地主家花天酒地，朱门酒肉臭；穷苦人吃糠咽菜，路有冻死骨。长河为了能省些糠菜给父母和弟弟吃，大年初二，就辞别了父母，顶风冒雪到许昌一带要饭，打零工去了。

几个月后，长河在外面要饭打零工，苦熬了一个冬春，省下小半布袋玉米回家了。两个弟弟见哥哥背回了玉米，喜出望外，抓着就要吃，母亲宝贝似地收起玉米说：“别着急，你爹打短工还没有回来，这点玉米等妈磨了，你爹回来后，咱们一齐吃。”真没想到，这点玉米刚倒在邻家磨上，就被地主景丙兰和狗腿子看见了。景丙兰擦着大衫，凶煞神似地说：“好，派的款项你不交，倒有粮食磨，给我拿走！”狗腿子得着主子的命令，就扑上前去要扫磨上的玉米。长河妈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她死死抓住狗腿子，大声喝道：“景丙兰，你欺人太甚了，这是我儿子要饭打零工省下来的，你不能拿走！”景丙兰一听，气急败坏，对准长河妈一阵拳打脚踢，长河妈被打昏了过去。

长河见妈迟迟不回，到磨房一看，磨上的粮食没有了，妈昏倒在磨道里。长河一下扑到妈身上大哭起来。闻声赶来的乡亲们，急忙帮长河把母亲抬回家去。

母亲的伤势很重，加上连气带饿，没熬多久就含恨死去了。临断气时，长河妈伸出干瘦的手摸着长河的头，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妈……是怎样……死的。……”

长河记住了，妈是被口称“仁义道德”，满肚子阴险毒辣的狗地主活活打死的，这笔血债，燃起了他复仇的怒火，他不会忘记，永远也不会忘记。

被 逼 入 虎 口

长河妈死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长河爹为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他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去，打短工、做长工，长河领着两个弟弟拾草、砍柴、挖野菜，就这样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长河看着爹一天天瘦下去，很不忍心。就在他十二岁那年冬天，他对爹说，要去下煤窑。听了孩子的话，父亲紧紧搂着长河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扑嗒扑嗒往下落。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谁都知道，下了资本家的煤窑，十有九难熬。当爹的实在不忍心把孩子往虎口里送，但不这样又怎么办呢？眼看着三个孩子饿得骨瘦如柴，最后他只好咬咬牙答应了。

董长河第一次下的煤窑叫洞上煤窑。煤窑资本家姓谷，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长河去煤窑的第一天，正碰上谷胖子对从各地骗来的几十个人讲话，他说：“兄弟开窑，不图发财，只为帮大家渡饥荒。你们日子好过了，只要说一句我谷某是讲‘仁义’的人就行啦……。”又是“仁义”两个字。

长河听了，不禁心里打了个寒噤，两年前的辛酸往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斑斑血泪使长河明白了一个道理：地主讲的“仁义”，就是吃人肉，喝人血。但是资本家讲的“仁义”又是啥样呢？他怀着疑惧不安的心情开始了煤窑生活。

初到井口，长河见煤井里面黑古隆冬，井壁石头龇着牙，有的地方还不断掉渣，煤井就好象一只巨大的野兽张着血盆大口。提升工具是木头架子上绑个人绞的辘轳，辘轳上缠着一根粗麻绳，工人们就靠这根绳上上下下。看到这种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故的煤井，长河心里有几分胆怯，他正在迟疑是下还是不下的时候，冷不防，把头一鞭子抽在身上，嘴里还骂道：“他妈的，想溜，怕死就别干这一行！”说着，过来两个把头，硬把长河的两腿穿在绳套里，推下了深井。董长河下到井底，伸手不见五指，更是阴森可怕，巷道低得人弯着腰才能勉强通过。因为不通风，瓦斯排不出去，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加上巷道里不断传来把头的鞭子声，叫骂声和工人们的呻吟声，这哪里是煤窑，简直是人间地狱！

董长河身小力薄，把头派他和另外一个童工抬水。那童工因为饿死了父母，无家可归，才来下窑。初开始，他俩抬个大水桶一歪一扭还勉强能抬动，后来，连累带饿，一抬起水桶，腿就打颤。抬了一段，实在抬不动了，他俩放下水桶，刚要坐下歇一会，一根荆条拧成的鞭子，辟里啪啦，便打在那童工和长河的头上，接着又是几脚。长河只觉得头一沉，天眩地转，便栽倒在煤水里了。这时工友们纷纷围过来，指着把头大声质问：“你为啥把这两个孩子往死里打？”

有的说：“你们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啥‘仁义道德’？净是老虎戴佛珠——假充‘善人’。”把头见工人越围越多，知道众怒难犯，吓得一边往后退，一边强装好汉地说：“‘仁义’，老子的‘仁义’就是鞭子，以后谁再耍滑不干活，‘仁义’的还在后头哩！”说罢就赶快溜走了。

工友们把长河从煤水里捞上来，空了空肚子里的水，约摸两袋烟工夫，长河才慢慢醒过来，他感到浑身疼痛难忍。当他看到自己的小伙伴已被活活打死，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一个老工人给他擦干眼泪，愤怒地说：“资本家和地主一个样，都是说人话不做人事的黑心狼。眼泪冲不走他们的假仁假义，大家只有团结起来跟他们斗，才有出路。”这些话，董长河听起来句句在理。当天晚上，长河躺在豆杆窝里，大睁两眼睡不着，他想起惨死的妈妈、弟弟、小伙伴，这一桩桩的辛酸往事，那一件不是仇和恨交织而成的啊！他渐渐懂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资本家虽然手拿佛珠念“仁义”，实际上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穷人只有斗争才有活路。

冲 出 鬼 门 关

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蹄踏到河南以后，他们在大肆掠夺我国各种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加紧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豫西浅山一带开煤窑的资本家们，纷纷跪倒在日本帝国主义脚下，成了日本鬼子压迫和剥削矿工的走

狗和帮凶，一时黑云压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头上压着重重火山，看不见一丝光明。

这年，董长河为生活所迫，来到石匣煤矿挖煤，这个矿的资本家一面鸚鵡学舌地跟着日本鬼子高喊“平等”、“自由”、“博爱”，一面疯狂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工人一下井就是二十四个小时。饿了啃一口糠窝窝头，渴了喝一口稠乎乎的黑煤水。有的工人连糠窝窝也吃不上，就只好整班挨饿。而那些欺压工人的把头，他们每天吃饱了，喝足了，下井后，有的掂火锥，有的拿荆条，二事不干，专门寻事打工人。

董长河和工友们早看透了日本鬼子“平等”、“博爱”的鬼把戏，他们人人心里燃着一把火，想方设法和日本鬼子、资本家作斗争。

由于井下设备极坏，经常积水排不出去。工人破衣烂衫，就站在水里浸泡，时间长了，不少人手脚都烂了，满身長疥疮流黄水。当时，长河身上也长满了疥疮，说疼，疼得打颤，说痒，痒得钻心，工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钱治病，没办法，一流黄水，就只好往身上撒煤面，谁知越撒煤面越难受，简直疼痛难忍。资本家、狗把头对工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说什么“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苦力有的是。”矿工们气极了，商量好，遇到把头不在的时候就歇一歇，不给狗日的资本家干活。这样一来出煤就少了。资本家没有别的办法，就加派把头，不准工人出井。有一次，资本家连续三天三夜不准工人出井，每天只发给三

个又薄又小的高粱饼子。第三天头上，董长河连累带饿，沉重的煤袋压得一步一喘，移动一点好艰难哪！两个把头见长河走的慢，就饿狗一样朝长河扑来。鞭子在长河头上飞舞，鲜血马上流出来。长河用右手护头，右手食指“噤”一声被打断了。这时，长河再也忍不住满腔怒火，便咬着牙说：

“这样下去，早晚也得被你们打死，还不如跟你们这些恶狗拚了！”说着就一头往把头肚子上撞去。那家伙冷不防经这一撞，跌了个仰面朝天，抱着肚子直叫唤。另一个把头见董长河竟敢反抗，咬牙切齿地说：“好哇，你穷小子竟敢造反，今天别想活着出井！”说着，抡起鞭子又要打。“住手！”这喊声象一声炸雷，吓得把头不得不把扬起的鞭子放了下来。这时背煤的工人群起包围，把这个坏蛋围在当中，一个个愤怒的眼光逼视着把头。工友们怒吼着：“你敢再打一下，小心你的狗命！”把头见势不妙，不敢再张牙舞爪，只好强打精神，给自己壮胆说：“好，好，这次算我错打了人，谁高谁低走着瞧！”说罢，两个把头就狼狈地溜走了。

经过矿工的多次斗争，把头明着不敢随便打人，背地里却使坏主意，逼着矿工在危险的地方采煤。一天夜里，巷道的顶板咔咔直响，帮上哗哗一个劲地掉煤，看来一场大冒顶的事故很快就要发生了。长河和另一个工人景文提就在这个场子采煤。长河急忙对把头魏豹子说：“这个地方不能再采了，再采会冒顶。”魏豹子毫不在乎，催着说：“冒不了，快干！”景文提也愤怒地说：“眼看要塌，你硬要采，到底安的什么心？”“塌也得给我采！”魏豹子还不让出来，硬

逼着矿工拚着命为他们采煤。不一会“轰隆”一声巨响，冒顶了，景文提未跑出来，活活被砸死在里边。魏豹子见出了人命，怕工人找他算账，便偷偷地溜走了。

对于阶级兄弟的惨死，大伙怒火满腔，工友们有的要立即上去找资本家说理；有的主张躺下来睡觉。董长河说：

“日本鬼子和资本家利用煤窑喝我们工人的血，吃我们工人的肉，我们趁机会把窑放塌，大家趁黑夜逃出这‘鬼门关’！”工友们一听长河的主意痛快，便立即行动，砸工具的砸工具，放坑木的放坑木，不大一会儿，就把资本家的煤窑捣得七零八落，然后大家手拉手沿着斜井的陡坡往上爬去。好容易爬到井口一看，把头因怕矿工逃跑，把门锁得严严实实。正在这紧急关头，长河“唰”地从腰里抽出一把准备好的破斧子，对准大锁狠狠砸了几下，把锁砸开了。接着，一百多个矿工象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向茫茫旷野，奔向四面八方。

血债要用血来还

以后，董长河又换了几处煤窑，但换不掉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这些煤窑的资本家一个比一个更阴险更狠毒。日本鬼子投降以后，长河决定不再下煤窑了。可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世上纵有千条路，哪有穷人的路一条呢！

一九四六年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长河和另外两个乡亲正在山路上行走，突然，旁边沟里窜出六条饿狼一样的家伙，手持短枪，不由分说就用黑布蒙上长河他们三人

的眼睛，背绑着双手拉走了。

长河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被带到了以凶残歹毒闻名的方山圈窑里去了。穷人们说：“方山窑是阎王殿，穷人进去出来难。”阎王殿真是名不虚传。圈窑只有一个门，门口站着拿枪的狗腿子。四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围墙上扎满了铁蒺藜。工友们上了井就被关在里头，连动也不能动。圈窑的资本家刘双进，既是煤井的大老板，又是当地伪治安队的一个头目，仗着有钱有势又有枪，平时胡作非为，坏事干尽。周围的穷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活阎王”，大家见了他都象避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没人去他那里下窑。他没有办法，就派狗腿子到处抓人，抓来以后，终年四季逼着为他卖命，谁要稍有反抗，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圈窑周围白骨累累，死在圈窑里的阶级兄弟真是数也数不清啊！

长河被抓去后，把头派他拉煤拖，二百多斤的拖，没拉多长时间，肩上、背上的肉就磨烂了。阶级弟兄心连心，装煤的工人见他身小力薄实在可怜，就偷偷地给他少装点。一次，长河拉着大半拖煤，正吃力地走着，迎面来了一个把头。他一见长河拉的拖没装满，就一步跨到长河拉的煤拖上，长河拉一步，把头打一鞭，嘴里还不住地骂着：“他妈的，我叫你拉半拖……！”长河气得牙都快咬碎了，心想就是当牛作马，挨鞭子也有时候，哪象这走一步挨一鞭。想到这里，他猛地回过回头来，一把夺过把头的鞭子，厉声喝道：

“滚下来！”把头正要发作，长河狠狠一鞭子朝把头头上抽去，把头“妈呀！”喊了一声，抱着头逃跑了。

一场灾难降临了。

当天下午，董长河刚出井，迎面就过来几个持枪的家伙，不容分说把长河捆了起来，吊在一棵枣树上毒打起来。皮鞭如同毒蛇在头上飞舞，殷红的鲜血一滴一滴渗到地上，长河被打昏过去。

工友们闻讯赶来，把长河救了出来。安置在一个破窑洞里，一个老工人从自己身上撕下来一块块破棉絮，轻轻地擦拭着长河身上的血迹。他对大家说：“咱们矿工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总有一天要这些狗豺狼加倍偿还。”长河慢慢地苏醒过来，他看到周围一个个关怀、深情的眼神，霎时一股阶级友爱的暖流通遍全身。真是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兄弟友爱深哪！长河望着工友们，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从此，长河身上又增加了新的伤疤，这伤疤记下了地主、资本家的血腥罪恶，也唤起了长河的觉醒。“仁者吃人”这就是地主、资本家的强盗本性。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打过了黄河，这消息象春风一样传遍了豫西大地。方山圈煤窑的资本家刘双进这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茶饭无心，坐立不安。他一反常态，藏起了狰狞的面孔，装出一副假像，给工人发白馍和鸡蛋，并且还张罗着开会，向工人散布孔孟之道：胡说什么“斗为仇、和为友”，梦想麻痹工人斗志，把他过去的罪恶一笔勾销。刘双进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真的改邪归正了吗？没有，他不会放下屠刀，也不会立地成佛。在暗地里他磨刀霍霍，准备反扑，企图保住他

将要失去的天堂。一天夜里，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河水与山洪汇集在一起，冲破了堤坝，灌进了矿井，资本家刘双进认为他反扑的时机到了，命令把头把井绳砍断，企图把一百多名矿工淹死在矿井里。这时，矿工见雨水已经灌进矿井，纷纷涌到井筒下面，准备升上来，但一看井绳被砍断了，井里的水很快就齐腰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长河忽然想起斜井，大喊一声：“快从斜井跑出去！”矿工们迅速从斜井冲了出来。这一百多名矿工汇成了一股复仇的洪流，他们席卷整个方山圈窑，要捉拿刽子手刘双进讨还血债。这时刘双进已知自己的阴谋暴露，他来不及逃跑，钻在床底下直打哆嗦，矿工们找到了这个恶狼，把他从床底下揪了出来，愤怒的人群象火山爆发一样，严惩了这个杀人刽子手刘双进，为民除了一害。

继续革命永向前

光明驱散了黑暗，红太阳照亮了灾难深重的矿山，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全国人民。昔日的“煤黑子”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董长河和全国广大贫苦人民一样翻了身，见到了光明。

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董长河同志又重新来到新密煤矿当矿工，长河看到社会主义新矿山，到处阳光灿烂，红旗飘扬，满面红光的矿工们正伴随着飞转的天轮进出矿井，大干社会主义。他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长河找到了离散多年的父亲和

两个弟弟。骨肉团圆，悲喜交加。他们感谢毛主席把他们从火坑里解放出来；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的今天。

董长河同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全心全意跟党走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九六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董长河同志又被广大工人推选为工宣队员，进驻了学校。在学校里，他经常给孩子们讲旧社会的苦，比比新社会的甜，教育下一代永远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发扬革命传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董长河同志多次登上讲台，联系自己的苦难家史，以亲身的体会批判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他痛斥一切反动没落阶级鼓吹的“仁政”，揭露“仁”的本质就是吃人。董长河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恢复那吃人的旧世界，要我们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防修反修，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现在董长河同志正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中共新疆矿务局委员会宣传部整理）

血泪的控诉

漯河市残废工人 敬文升

每当我想起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满腔仇恨立刻涌上心头，那苦难的往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老家住河南省长葛县。旧社会我家六口人，有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个。我家穷得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只有靠乞讨度日。一九四四年冬，全家逃荒到了周口。六口之家，光靠要饭怎能养家糊口？为了生活，父母亲无奈只得送我到信华烟厂去做工。这个工厂是由三个资本家合办的。工厂还有个工头，叫胡大胖子。这个工厂为了赶风头，多赚钱，先后搬过两个地方，先搬到安徽省的界首，后又搬到了河南漯河。

那时的工厂，真是工人的地狱。工人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潮湿地，虱子、跳蚤、臭虫、蚊子到处都是。为了吃碗饭，成年累月被迫给资本家没明没夜地干活。

这年腊月间，有钱人都在准备过年，烟也卖的特别快，资本家认为赚钱的时机已到，有利可图，硬逼着工人昼夜连着干，拚命地从工人身上榨取血汗。春节已经过去，但资本家仍不给工人们一点喘息机会，这样繁重的劳动，就是铁打

铜铸的人也受不了哇！

正月二十三这天夜里，风很大，天阴森森的。那时候，我是炕烟工。提起炕烟工，我伤心断肠，怒火满腔！那时候炕烟用的是柴炭，炕房里象火山一样，燎得人眼发硬，脸干黄，连气都喘不过来。当时我已经连续干了四十六天，资本家从来没有让我好好地休息一天，繁重的劳动，累得我头昏脑胀，吃不下饭，干着活，眼黑耳鸣，走起路来晕晕腾腾，弄不好就栽倒。我知道自己已经累出大病了，再这样干下去，死不了，也得脱层皮。我想：“这算个啥世道？难道工人就应该这样没死没活地为他们卖命吗？”想到这里，我就带着满肚子气去找资本家，请假看看病。资本家一听说我要请假，两眼一瞪，说：“净装哩，你请假谁替你炕烟，要看病你找人来替。”黑心的资本家，不把我们工人折磨死，他是不甘心的。当时我虽然心怀怒火，但是，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权力不在咱手里，只有自己干生气。

回到炕房后，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这时候，大堆炭火烧得正旺，一股呛人的热气迎面向我扑来。我走了没几步，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忽然晕倒了，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慢慢苏醒过来，感到两条腿疼痛难忍。我估计是烧着腿了，就一边挣扎着往外爬，一边喊着：“救人哪！救人哪！”当时我爬到炕边，刚想站起来的时候，又晕了过去。

后来我才听说是当时开车工李顺海，第一个听到了我喊救命的声音。就急忙向大伙说：“不好了，有谁在喊救命，

怕是炕烟房的老敬吧！”工友们闻讯赶来，当时我的衣服早烧成了灰，两条腿烧的吱吱响，骨头已经露了出来。看到这种情景，大伙啥也不顾，就把我用木板抬了出来，有的给我灌汤，有的给我找药，还有的去找资本家报信。真是阶级情意深，工人心连心啊！

资本家都在院子东边的楼上住着。李顺海、李顺喜等一些工友，跑到他们门口拍着门大声喊：“掌柜的，老敬的腿烧坏了，烧坏人啦！”可是，喊了半个钟头，没有一个人答腔。资本家哪管工人的死活！后来工友们只好先凑了几个钱，准备把我送到一家小医院里去。哪知工头胡大胖子这家伙偏偏又不叫开大门，说：“半夜三更，不准进出。”人在危急，哪能再迟延！大伙的肺都快气炸了，就又一块到东楼去找资本家。几个工友气愤地喊：“人都快烧死啦，你们到底管不管？”可是，这些狼心狗肺的家伙仍然连门也不开。却在里边恶狠狠地说：“喳呼什么，烧着人有啥了不起，你们快去上班，等天明再说。”这时胡大胖子狗仗人势就更凶了，硬逼着大家非上工不可。见此情景，工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啦，愤怒地说：“你们连工人的命都不要，还要硬逼着我们上工，好！你们等着吧！”几个工友商量说，看起来是我们越软他们越欺侮。我们不上工，串通其他工友也停工，治治这伙坏蛋。经过几个工友分头串通，一时全厂的机器都停了下来。这个办法果然有效，资本家听见机器停了，才被迫让胡大胖子打开了大门。

烟厂对门，有个私人小医院。到那里他们一看伤势很严

重，张口就要四、五百元，并且还要资本家亲自立字据。大伙决定，一方面去找资本家交涉，另一方面谁有钱，不管多少先兑出来。资本家宁愿不要工人的命，也舍不得半个分文，交涉没有成功。这时工友靳占首先把他积攒了三年多的四元五角钱拿了出来，给我买了药，打了两针止痛针，吃了几片止痛片和敷了药水。医院看我没有钱，资本家也不给写字据，说治不了，硬逼着将我抬了出去。这时已是深夜四点多钟了。风越刮越大，冷风吹到身上，烧伤处疼得更加厉害了，半小时就晕过去几次。我躺在木板上，喊叫一阵，昏迷一阵。大伙又把我抬到了教会医院。那时的医院可不是为咱工人办的呀！教会医院更是这样，有钱的抬进去，无钱的推出来。

一抬进医院，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慢条斯理地来到我的身边。他一看我的伤势，说声交钱住院，扭头就走了。

一听说叫住院，大伙想着有希望。可是，到会计室一问，会计一开口就要先交五百元。向哪里去弄五百元钱呢？只得再去找资本家交涉。

工人王起德找到资本家，一说要借钱，那个家伙面孔一板，说：“哼！烧伤是他自己不小心，要治你们给他治，与厂方无关。”推来推去，我一直在医院门外躺着，死一阵，活一阵，不省人事。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二十四日中午，工人兄弟看我的两条露出骨头的腿冻的发紫，伤势越来越重，急得团团转。无奈，他们再次找到院方，并言明愿意集体立约作保。谁知医

院根本不理。

我看到这种情况，忍着剧烈的疼痛，含着悲愤的眼泪，对工友们说：“你们对我也够费心了，算了吧！现在到处都不是咱穷人的天下呀！这次我要是死了，以后，请您们替我诉冤仇。”黄洪山等一些工友，一面安慰我，一面商量说：走，我们一齐再去找资本家，如果他们这次再不答应给老敬治伤，我们宁愿饿死，也不再给这些混蛋做工。厂方看这次去的人多，个个面带怒色，来势不对，怕闹出大事来，才勉强答应了派人去医院接洽，立了字据。

住院以后，医生随便检查了一下，就决定要锯腿。锯腿对我来说，不过是保存一条生命，可对资本家来说，钱比我的命更要紧。资本家和工头胡大胖子，看我已是残废，净落个白白花钱，便使出了诡计。他们一方面向医院交涉要抽回字据，说经济和人身厂方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又派人去叫我父母，想把我当面交回，来个顺水推舟。工人们听资本家要抽回字据，都一齐赶到了医院，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这样一来，吓得资本家没敢再提抽字据这件事。

恶噩传到家里，父母如闻霹雳。他们怀着悲伤的心情来到医院。当老人家看到我被烧的惨状，坐到我身边，哭得死去活来。我忍着仇恨，咽下眼泪，安慰老人家说：“你们不要伤心难过，就是哭死，现在也没有我们说理的地方。”

二十九日的下午，是我终生也忘不了的。我昏昏迷迷地躺在手术床上，什么也不知道。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双腿已经从膝盖下面锯了下来。



当时的医院哪把工人看成人哪！他们把我的腿随便锯下来后，既不精心护理，又不给上药，伤口一直往外流血水，慢慢地开始腐烂了。就这样，在医院躺了一两个月后，伤口不仅没有长住，腐烂的地方越来越大，伤势更加恶化了。

医院看情况不妙，在一天夜里，又偷偷地把我抬到了手术室。约摸有两三个钟头的时间，他们又把我抬回了病房。第二天一醒来，才发觉我的两条腿又被锯去了一节，这次是从大腿根下剩有不到三寸长的地方锯下来的。仇恨代替了我的眼泪。我的双腿就是这样被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

黑暗的旧社会，那有工人的路呀！那时，我满腔的仇恨，无处控诉。两个月后，连伤口还没有愈合，资本家就硬把我赶出了医院。出院后厂门都不让我进，就把我踢出了工厂。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失业的人，成千上万，象我这样失去了双腿成了残废的人更是无处求生。我只有流浪街头，乞讨度日。

正当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一九四八年，漯河解放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无数受压迫、受剥削、受摧残的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了出来，成了国家的主人。而在旧社会骑在工人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本家和地主恶霸，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制裁。我和全国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从此站起来了！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我同全国千百万工人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全家九口人，爱人和两个儿子在工厂当工人，儿媳是商店里的服务员，两个女儿都上了中学，

住上了新瓦房，吃饱穿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啊！要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象我这样失去双腿的人，有多少也不知早就饿死到哪里去啦。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可是，刘少奇、林彪一伙，却不顾铁的事实，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好形势说成一团漆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剥削有功”、“今不如昔”，真是反动透顶！他们完全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打起“克己复礼”的破旗，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企图把前进的历史车轮拉向后转。要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捱过寒冷夜，倍觉太阳暖。旧社会的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但是我们决不能有丝毫松懈，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我一定要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投身于批林批孔运动，用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痛斥刘少奇、林彪一伙的无耻谰言。我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伟大教导，不忘过去苦，牢记血泪仇，继续革命永不停，用我的亲身经历教育下一代，使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应时雨、王今川、宋秉坤整理）

徒 工 仇

河南省七一棉纺织厂退休老工人 葛祥云

每逢我看到现在的青年学徒工人，受到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时，对比我在旧社会苦难的徒工生活，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进 厂 难

一九二〇年，我刚十三岁，那时家里有六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两个弟弟。没有土地，全家靠父亲卖壮饼，妈和姐姐帮人家洗衣服维持着艰难的生活。我很小就去拾柴、拣煤核。这一年，父亲又积劳成疾病倒在床上，穷人哪里有钱看病，几个月后，爸爸连病带饿就悲愤地离开了人间。从此家里的日子更难熬了，经常揭不开锅，我只好半夜就起来到处去捋槐叶，给全家充饥，妈妈整天愁着日子怎么过下去呀？

一九二一年春天，华新纱厂招艺徒工（就是包身工，也叫养成工），资本家到处宣传：厂方“爱人为本”、“道德传家”，进厂学徒，住的是洋房、吃的是大米白面，每月还

给零花钱，三年期满，按月发给工资几十元。妈妈虽不信资本家的宣传，但由于生活所迫，正月十四那天就对我说：

“孩子，听说纱厂招艺徒工，妈托你葛瑞哥领你去报个名，要是人家收下你了，往后咱们的日子就可能好过点。”

葛瑞哥领我来到华新纱厂一间屋子里，一个长着鼠眼猴腮的家伙坐在椅子上，葛瑞哥向他说明来意后，那人哼了一声，翻起白眼直瞪我，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啦？家里有什么人？我一一回答了。那人从桌上拿起一张印好的纸说：“填写‘志愿书’、找保人吧！上面写得清楚：管吃管住，每月发给两角零用钱；只许工厂辞退不用，不准中途离厂不干；不干得赔偿饭钱、房钱……。”最后，他向我说：“找到了铺保，就来上工。”

妈听说我报上了名，还要找铺保才能上工，愁得一夜也没睡着觉。当时有句俗语：“富住深山有远亲，穷站街头没人问”。俺家穷得揭不开锅，有钱人家哪能攀得上？后来，还是妈当了件破棉袄，弄了几个钱，买了匣点心，给一家开挂面铺的掌柜送去，人家才给盖了章、作了保人。我又捺了手印，画了“+”字，这才算办完了手续。

太阳偏西了，我扛条破烂的小薄被子来到工厂，把“志愿书”交给那个鼠眼猴腮的家伙。他开了一张条子，让人领我到艺徒工住的工房。工房的门口站着两个凶恶的背警棍的厂警，墙上围着电网，老远就觉得阴森可怕。一会儿，一个厂警从管理处走出来，一摆手说：“跟我来！”把我引进一个阴暗潮湿的屋子里，指定一个铺位。

大约一袋烟工夫，当唧唧的铃声响起来，院里挤满了和我年纪大小差不多的童工。吃过饭排好队，管理处出来一个人，手拿点名册点名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管理处的主任。这家伙长着一脸横肉，看上去真使人恶心。点完名后，把我分到了华字班。

人 间 阎 王 殿

进厂当童工，好比进了人间阎王殿，不死也得脱层皮。

第一天夜里，我们一群刚招进厂的童工，就被厂警前后押着上工了。这一夜分给我的杂活是打扫车间。到了后半夜，我去厕所里解手，瞌睡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忽然闯进一个恶徒来，手里掂着棍，上去揪住我的耳朵，从厕所里把我拖出来骂道：“他妈的，上班头一夜就偷懒、睡觉！”骂着，照屁股打了我几棍子，又跺了我一脚。我要反抗，人小力薄怎能抵得过，但我心里恨透了那个坏家伙。进厂前我想熬上三年，一月拿点钱，能养家糊口，可万万没想到一进厂就挨打，资本家真把我们穷人不当人看啊！从此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资本家仇恨的种子。

夜里，我们十个人挤在一间小黑屋里，潮湿得没有一块干地方。睡的是从机器箱子上拆下来的碎板子，沿着三堵墙钉成二尺宽的“床板”，童工们头顶头、脚对脚地挤在一块。五黄六月天，汗发出的臭气直呛鼻子，臭虫多得乱爬，人躺在床上，臭虫几乎能把你抬起来。数九寒冬，屋里不生

火，一夜也暖不热被窝，但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困倦得很，一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起床铃当啷当啷一响，厂警便来到了床边。谁醒迟点，警棍便狠狠地打在身上。

有一天，我发虐疾，夜里发烧，浑身上下烧得火炭子一样，昏昏迷迷没听见铃声。“懒鬼王八蛋！快起，快起！”厂警一连打了几棍子。豺狼没有资本家的心肠狠，毒蛇没有资本家的手段毒。童工管理处定有规矩：能喝口汤水，就得上班干活。起了床，我哪里吃得下饭，勉强喝了两口稀菜汤，带着病也得去上班。那时的伙食是：早晚是漂糠的稀米汤或老菠菜汤，两个用红面做的又粗又硬的小馍，一小块咸菜。打夜班，前后隔十四个钟头，只发给三个馍。到班上，我双手捂着肚子强支着看车。趁领班的工头去吃饭时，我拿起放在车头上的硬馍想咬一口，馍上落上了棉花毛，象长了一层白毛羽，实在难咽。我难受得很，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邻车的一位蔡老师傅说：“你少歇一会儿，我给你照顾着车子。”我刚在车头边蹲下，工头就来了，上去给我一耳光，赶我去看车，我怒视着工头，跌跌撞撞地走到车前。

这情景那位蔡师傅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大声质问工头说：“病得这样子，不给看病，强迫干活还打人，真不讲理……。”他转过脸来又亲切地对我说：“你干脆躺下歇着，出事有我呢？”这话象一阵春风吹暖了我的心，我激动地说“蔡师傅，你真好啊？”蔡师傅果断地说：“别说这个，咱们穷工人还不是一家人吗！”一席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开始感到老工人和童工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心连心啊！

当时的工厂，简直是座“地狱”，资本家对待工人连牲畜都不如。有一次，徒工赵小五想用砂轮把破钉子打磨成钩刀，钩罗拉花用。他下班时忘在口袋里，被搜身的搜了出来，诬说他是偷的，竟给了“隔耳穿钉”的残酷刑罚。那天，我们被押着去接早班，刚走进厂门，就听见“哎哟，哎哟”凄惨的叫声。一抬头，我浑身象凉水浇的一样，刷地一冷。只见徒工赵小五五花大绑，耳朵上斜穿着两根铁锭子，被几个厂警押着，脸上血淋淋的。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竭力鼓吹什么“仁者爱人”，我厂的资本家也大肆宣扬什么“爱人为本”、“道德传家”。铁的事实证明，他们“爱人”的实质是吃人，他们从来不爱我们工人阶级；他们的道德就是杀人不眨眼啊！叛徒、卖国贼林彪捧出孔孟的亡灵，打起“仁政”的破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用孔孟之道敲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门，把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重新扶植上台，让我们工人阶级重新当牛做马做奴隶，我们坚决不答应！

罄南山之竹也书不尽资本家欠下我们工人的血债，倾东海之水也倒不尽我们工人在旧社会的苦水。我们目睹赵小五被害的惨景，噙着眼泪不忍心再看下去。怒从心头起，火在胸中烧，顿时被押的队伍就乱了，厂警赶我们去上班，我们就是不去。这时上班的工人越聚越多，愤怒的抗议声震撼着整个厂房。“这样坑害我们工人，太不讲理啦，不放赵小五，我们坚决不去接班！”怒吼声不断地从人群中迸发出来。眼看接班的时间就要到了，人群有聚无散，仍无一人上



班。厂警一看势头不妙，被迫把赵小五送进了屋子。

毒打、饥饿、疲劳、折磨得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一天吃过午饭，我趁守门的厂警不注意就逃跑回家。见了亲人，我倾诉着在厂里受苦受罪的经过。妈听后愤愤地说：“原来他们的宣传都是骗人的鬼话啊！”妈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用衣襟轻轻地给我擦眼泪，她豆大的泪珠扑嗒扑嗒落在我脸上。屋子里充满了仇恨的怒火。

厂里派人来抓我了，妈紧紧地用身子护着我。我哭喊着：“妈，我死也不回去！”妈心疼地说：“乖孩子，咱不去了”。这时，一个厂警拿出“卖身契”威胁说：“这是你们填写的‘志愿书’，上面写得明白：中途不干得赔出三年的饭钱、房钱！”“吃的还没有，去那弄三年的饭钱房费！”妈愤怒地说。“走，快回去！”两个厂警把我从妈手里抢走了。这时，妈向前急走几步，把我从厂警手里夺了回来，严厉地怒斥道：“等等，给孩子换件衣裳。”

回到徒工房，管理处主任程老罐子掂起棍子把我按倒在地就打。一边打一边问我：“还跑不跑啦？”我拚命地反抗着。仇恨的怒火在燃烧，周围的徒工也都愤愤不平，蜂拥而上。大伙发出一阵吼声：“住手！”、“不许打人！”这声音和一道道怒视的目光，汇聚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放下棍子，伙伴们把我搀扶进屋里。

我的屁股被打得红肿起来，疼得连路也走不动。第二天捂着屁股还得去上班。唉！那张“志愿书”说得怪好听，管吃管住，实在是一张“卖身契”呀！我恨不得把它夺回撕个

粉碎。

那时候，当徒工学点技术，真是用血和汗换来的。进厂前半年是干些扫地、运棉花、收筒管等杂活，后半半年才叫帮车。徒工们多么想学点手艺呀！有一次，我正跟车工蔡老师傅学接头，被工头瞧见了，他狠狠地打我一拳头说：“扫你的地去！”一天，我送完筒子回来，靠近车子用心地在看棉网咋样进到喇叭口，又下来纺成条子的？工头从后面走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给我一巴掌，我的上排牙碰在并条机的铁板上，霎时满嘴流血。尽管受尽了工头的毒打和折磨，在老师傅的帮助下我终于学会看车了。这时，车间领班分给我一部粗纱车叫我看。刚学会看车，工作时心里有点慌，在换纱时碰掉一个外排的大粗纱，把锭翼（落子）上的洋枪管砸断了一根。车间领班石老皮把我叫到他的账桌前，气势汹汹地问我：“你知道一个洋枪管值多少钱？”嗯！得四块现大洋。”他狠狠地扇了我两记耳光。接着他在账桌边画了一个圆圈，罚我跪了两个钟头。那些资本家的狗腿多么恶毒！他们“画地为牢”，自立刑罚。当时，我真想和他拚个死活，但刀把子人家握着，有什么用呢？这还不算完，他回到账桌上，提笔写了个三指宽的白纸条：“葛祥云砸断一根洋枪管，罚洋两角。”转身贴在柱子前的黑板上。当时我一月才挣两角钱，一下被罚光了。看！这就是资本家讲的“爱人”，“道德”，多么好听啊！我们徒工每天尝到和见到的就是苦役、鞭打、惩罚、饥饿和死亡。

仇恨的种子要发芽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天上夜班，趁工头石老皮不在时，看粗纱车的徒工们商议了一下，决定对资本家来个报复。我们迅速地拿起沉甸甸的铁砣砸起粗纱管来。咔嚓一个，咔嚓一个，狠狠地砸坏了一堆，又很快地扔进盛坏管子的大箱子里。这时，别处都传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车间工人们都很高兴，一张张脸上露出欣快的微笑，好象说：“干得好，干得痛快！”

工人们齐心协力，一个反抗斗争的局面在车间形成了。细纱车工也巧妙地想办法“延慢车”——看车省力气，少纺纱……。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学来了“偷亨司”（亨司是计算粗纱产量的单位，偷亨司就是纺假亨司）当石老皮离开车间去吃饭时，我赶快把车尾上装的亨司表拿下来，去插到细纱车上的筒管上突路，突路飞快旋转，一会儿亨司表上的产量数就多了，回来再按在粗纱车上，不按表上那个小细针。这样，车子哗哗、哗哗……开着，也纺不出粗纱条子，亨司表上却明显标出要求纺的亨司数字。这样，等石老皮转过来，我就做个看车的样子，那家伙一走出去，我们就休息。

我们徒工，忍饥挨饿、受气挨打，在黑暗的旧社会，在人间地狱里挣扎，总算熬过了三个年头，终于盼到了期满的日子——正月十四日。但是厂里却没人提我们出师的事。一天、两天……一星期过去了，出师的事，厂里一直没人提，

我们徒工气愤填胸，理直气壮地质问管理处主任，他冷漠地说，这件事他管不着，让问技师廖伯英去。

“走！找廖伯英去！”徒工们一下子把廖伯英围个严严实实。

“我们徒工规定三年师满，已经过了两星期多，怎么还不……”

“这个——你们不用问，该满师就告诉你们啦！”廖伯英蛮横无理地打断我们的话。

大伙一听，非常气愤，齐声质问道：“‘志愿书’上明明写着三年期满，为啥到期不让我们徒工出师？”

这时，廖伯英一拍屁股说：“三年满，四年圆，写的是一回事，办，又是一回事，再延长半年。”资本家从自己嘴里说的话，自己又说不算数。我们早就顶个熟练技术工人干活啦，不给我们工资，还无理延长我们的学徒时间，我们怎能愿意！怒火胸中烧，反抗火焰高。我们牙咬得咯咯作响，攥紧了拳头，准备和廖伯英决斗一场，那家伙看势不妙，便龟缩到屋里，被迫答应给我们每月增加三角钱。

那时候，厂里还没有地下党的领导，我厂的工人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是处在自在阶级的地位，但无情的阶级压迫，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用怠工、毁坏生产工具等形式同资本家展开了斗争。我们终日盼哪、盼哪，盼望着工人翻身当家那一天。

永远不忘徒工仇

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终于结束了。解放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五〇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一年又提我当了技术员。我想起四、五十年前血泪的学徒生活，恨不得一下子把我的全部技术都教给青年工人，来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建立了新型的师徒关系，大家政治上互相关心，技术上共同提高，先后培养了四十多名徒工，他们有不少人早已担任了平车队长或技术员。

解放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我们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给工人安排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厂里有政治夜校、工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工人理论读书班、技工学校，聘有专职和业余教师。工人们学政治、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批判资产阶级，一支业余理论队伍茁壮成长。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还一个心眼想为厂里作些工作。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胡说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要把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解放”出来。听到那些谬论，更加激起了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今天，我们虽然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决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受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及各国反动派的奴役和压迫。我们要立足本职、放眼世界，焕发精神，多干工作，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为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终生！

（陈辉支整理）